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

周洪宇 总主编

申国昌 副总主编

赵厚勰 刘训华 主编

第七卷 中华民国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

周洪宇 总主编
申国昌 副总主编

赵厚勰 刘训华 主编
第七卷 中华民国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 第七卷, 中华民国/周洪宇总主编;
赵厚勰, 刘训华主编.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328-9983-8

I. ①中… II. ①周… ②赵… ③刘… III. ①教育史
—中国—民国 IV. ①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9250 号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

周洪宇 总主编 中国昌 副总主编

第七卷 中华民国

赵厚勰 刘训华 主编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45 印张

字 数: 6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9983-8

定 价: 135.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9-2925659

总序

教育历史犹如一条由无数支流汇集而成的长河，蜿蜒曲折，绵延不断，奔腾不息，真可谓“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汇聚成教育历史大河的支流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充满智慧火花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又有规约办学行为的教育制度与管理规章，也有生动具体鲜活的办学行为与教育活动，这是客观的教育历史展现给我们的真实历史场景。然而，在日后记录的教育史与研究的教育史当中，由于精英教育思想与官方教育制度在历史上留下丰富的史料，后人在研究过程中可以信手拈来，教育史学便只停留在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这两大领域。因此，在百余年的中国教育史学发展历程中，尽管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等几套大部头通史以及各种专题史相继面世，但就总体而言，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两个方面，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了思维定式，仿佛教育史只包括这两大领域。殊不知，还有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一块研究内容，那就是教育活动史，而长期以来置于被人遗忘的角落。我们意欲本着“史论结合”“古为今用”的原则，重点研究教育活动史，以补过往研究之缺失。试图通过大量第一手史料来构筑不同历史时期各类教育活动的轮廓，梳理教育活动历史脉络，力求生动再现活动层面的教育历史，总结不同时期教育活动的特点与规律，找寻历代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基点与源泉，重塑教育历史的完整图景，重构教育史学的学科格局，并为当今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

所谓教育活动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微观、具体、日常的活动历史，是对教育历史实况的微观回溯与具体展现。通过回归历史现场进而实现对教育历史活动的原生态研究，可以真正体现人的活动是教育的中心这一主旨。从教育学研究来看，最能充分体现教育本质的是人的“教育活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教育活动是教育现象得以存在的基本形式。正如苏联学者休金娜所说：“人的活动是社会及其全部价值存在与发展的本原，是人的生命以及人作为个性的发展与形成的源泉。教育学离开了活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任何一项教育、教学、发展的任务。”^① 第二，教育活动是影响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是教育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培养人是教育所指向的最高目标。人的活动是教育的中心问题，也是教育最基本的着眼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最高鹄的。人的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即活动的结果。个体的活动是个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确定教育活动是影响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不排斥教育在人

^① 瞿葆奎主编，吴慧珠等选编：《教育学文集·课外校外活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的发展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而且为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指明了努力方向。任何国家的教育学研究，都把对教育活动的研究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

同样道理，教育活动史理应成为教育史学研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活动史既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起源，又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还是连接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的中介和桥梁。教育活动史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构成一种倒三角关系，教育活动史是起源、前提和基础，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是派生物和结果。可以说，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三者相辅相成，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如同教育学不研究人们的教育活动就无法进行一样，教育史学不研究教育活动史，仅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将会缺失其前提和基础，只能是一门“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行”的教育史学。因此，开展教育活动史研究十分必要且非常重要。只有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三者并存，才有可能构筑完整意义上的教育史学体系。

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第一代教育史学家群体中有不少人已认识到研究教育活动史的重要性，或直接倡导研究教育活动史。王凤喈在其被教育部列为统编大学教材的《中国教育史》“绪论”中明确指出“教育史为记载教育活动之历史”^①，研究教育史，不能孤立地研究历史上的教育活动，而是应与政治制度、社会思想乃至社会之全部相联系、比照来进行，应将教育史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研究。陈青之在其被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的《中国教育史》中也写道：教育史之内容，包括实际与理论两方面，教育制度、教育实施状况及教育者生活等属于实际方面，政府的教育宗旨、学者的教育学说及时代的教育思潮等属于理论方面。^②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也强调，教育事实“包有两种要素，其一为教育之理论方面，其二为教育之实际方面。前者是关于教育之理想或方案等一种思想或学说，此乃构成教育事实之奥柢者，

^① 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国立编译馆1945年版。

^②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后者是根据上述的思想或学说而使其具体化与特殊化者，例如实地教学、教材、设备、制度等均是。……此种理论或实际，若为某教育家所倡导或实施时，须将其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与教育事实一并考究”^①。杨贤江在《教育史 ABC》中也说道：“详尽的教育史书，必要对于教育事实之变迁发达分为教育的事实、教育者的活动与教育制度法规等等。”^②显而易见，陈青之、雷通群所讲“教育实际”，不仅包括教育制度，而且包括教育实施状况与教育者生活以及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而这些正是典型的人的教育活动，也就是杨贤江所讲“教育者的活动”。对其做历史的研究，正是教育活动史研究的范畴。

也许是早期教育史学家在表述时，习惯于采用源于传统“知与行”范畴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际”的两分法，而且对“教育实际”的表述又多用于教育制度，而少用于教育实施状况与教育者生活以及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因此，后继的教育史学者渐渐在无形中将“教育实际”的内涵逐步狭窄化，最后趋于混淆和消解。久而久之，沿袭下来，以至于习焉不察，司空见惯，因而教育史学界通常认为，教育史就是研究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而不包括教育活动史。教育活动史不是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被囊括在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之中。这样就无形中导致教育活动史长期被学术界忽略与轻视，成为一个被人们长期遗忘的角落和无人开垦的处女地。这个长期未受人关注的学术领地，恰恰是当今教育史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是最核心的研究内容。研究教育活动史，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教育史研究内容，拓展研究领域，丰富和完善已有的教育史学科格局；有助于促进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促进学术视野下移；有利于生动展现教育历史的活动图景。研究教育活动史，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重要。一方面，有助于形成“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使人们更加关注教师与学生的生活状况，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氛围，营造更有利于学生成长与发展的教育环境；另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关注教育活动与实践，关注具体的教育行为和微观的教学活动，

① 雷通群：《西洋教育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2 页。

② 杨贤江：《教育史 ABC》，见《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21 页。

进而更好地激励广大师生投身于教育与教学改革实践当中，以实际行动推动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的编撰与问世，正是顺应这一学术需求和社会需要所做出的实践呼应。

应该看到，教育活动史是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并列的，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共同构成教育史学研究的三大领域。以往将教育活动史融化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中的理解和做法，是不妥当的。那不是重视教育活动史，而是忽视教育活动史，消解教育活动史。对于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应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来予以重视和关注。

教育活动史主要以历史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日常的、微观的、感性的、实在的、具体的教育活动的发展及演变历史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人类历史上各种直接以促进人的有价值发展为目的的具体活动以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参与教育过程、进行互动的各种方式的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具体包括：分析教育史上教师、学生、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内外部活动及其表现形式和特征，探索这些活动发生、发展的规律及作用；研究家庭教育活动、社会教育活动的內容、形式的演变历史及其规律，等等。主要研究各类教育行为史、教育生活史、学校办学史、教学活动史、教师活动史、校长活动史、家庭教育活动史、社会教化活动史、民间教育活动史、教育社团活动史、科技教育活动史、宗教教育活动史、文化教育传播史、海外教育活动史等。教育制度史则主要研究有组织的教育和教学机构体系，包括学校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变迁，也包括对教育政策和法规产生、发展及演变历史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学校教育制度史、教育行政制度史、教育管理史、教育宗旨史、教育政策史、教育法规史、教育立法史等。而教育思想史主要以教育历史上的教育理论思维为对象，研究教育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兼及对教育历史人物评价以及对社会阶层、学术流派、社会团体的教育主张和思想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教育思想、教育思潮、教育流派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主要研究教育概念史、教育范畴史、教育主张史、教育思潮史、教育流派史等。

教育活动史的研究重点在于人的微观、具体和日常活动。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最直接、最基本的着眼点。^①因此，要着重研究教育历史上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日常活动，包括探究教师教学实况、教师生活状况、学生学习生活、校长治校活动等日常的微观的教育情节；探究历史上的家庭家族教育活动，包括家庭发蒙活动、家庭品行教育、家法惩戒活动等家庭教育的一般场景；探究历史上社会教化活动，如乡规民约教育活动、宗教礼仪教育活动、民风民俗传承活动等。

具体而言，教育活动史研究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主要分析教育史上教师、学生、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内外部活动及其表现形式和特征，探索这些活动发生、发展的轨迹及影响。重点研究教育政策制定活动、官方教育改革活动、学校经费筹集活动、学校日常教学活动、校长日常管理活动、教师日常生活状况、教师选聘考核活动、师生交往互动活动、学生日常生活、学生课余生活、学生应试活动、学生教学实习活动、学潮学运活动、学校后勤服务活动等。这些都是基层教育的日常活动，看起来平淡无奇，恰恰能够真实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教学活动实况。二是研究家庭教育活动。主要挖掘不同历史时期家庭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的演变历史，从中总结出家庭教育活动的规律，从而为当今独生子女家庭提高教育效率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重点研究家庭家族教育活动、宗族宗派教育活动、家庭启蒙教育活动、家族家法教育活动、家庭礼仪教育活动、家庭艺术教育活动、家庭婚姻教育活动等，力求展示真实生动的家庭教育历史情景。三是研究社会与民间教化活动。主要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教化活动、民间教育活动的演变历程，总结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与特征，探究社会教育活动的影响及规律。重点挖掘乡规民约教育活动、民风民俗教育活动、宗教礼仪教育活动、民间科技教育活动、民间文艺教育活动、民间武术教育活动、民间社团教育活动、社会各界助学活动、民间

① 扈中平：《人是教育的出发点》，载《教育研究》1989年第8期。

女子教育活动、民间教育交流活动等。四是研究历代文教政策的形成及其实施过程。主要研究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晚清、民国、共和国等不同历史时期，重大文教政策的酝酿、制定、出台、颁布过程，以及历代文教政策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及社会教育中的实施与落实情况。重点从活动的视角，去审视历代文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同于教育制度史只注重于描述历代教育制度的内容与文本，我们重在研究制度生成之前，教育家与民众的呼吁、官方的重视、制度制定过程、颁布后的反映以及对教育活动的影响等。以上这些就是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二

教育活动，是有目的的人的活动，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向互动的活动，也是一种发展性与基础性活动。教育活动是以人为中心的活动，是基础的实践活动，也是彰显人的个性与自由的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性的本真展现。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的、社会历史性的存在，就是因为他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之所以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就在于他具有自由的有意识的本性，在于他的实践性生存方式，这是人的发展理论的立论基础。^① 人性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也是理想和本真意义上的实践。因此，教育活动史主要展示人的活动，其理论基础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其首要和基本观点的唯物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反映时代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② 因为实践是以一定知识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为基础，被一定欲望和情感所驱动，受一定意志所支配的主体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改造客观的活动，实践本身就体现了主体角色与功能。因此，教育活动史的基本特征是主体性、目的性、互动性。主体性，即教育活动史时刻围绕教育的主体——人的活动，研究历史上人的活动是教育活动史的基本任务。目

① 陈新夏：《人性与人的本质及人的发展》，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② 肖前、李淮春、杨耕主编：《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的性，是事物活动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意向性特征，世界万物中只有人才具有自觉的有意识的目的性活动特征，而教育活动的最基本特征就是目的性和意向性，呈现历史上促进人有价值发展的有目的活动正是教育活动史的指归。互动性，是指教育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共生的关系，教育活动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一种互动与双向活动。教育活动史的基本特征，往往渗透和体现在历史上基层的、民间的、日常的、微观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活动之中。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将历史时段分为三种：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其中，长时段是一个“几乎不动的历史时间”^①，主要包括地理与生态环境的时间、文化与心态结构的时间、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时间等，这些都是缓慢流逝和变动的历史；中时段，是社会、人口、经济运动的时间，变化周期相对于前者要快一些；短时段，是政治、军事、人物活动的时间，这种历史所表现的只是表层运动，节奏短促、快速。^②教育活动的历史，就是一种长时段历史，往往在数百年之内很难看出其明显的变化。纵观中国教育活动史，不难看出，历史上始终贯穿着统治者与人民大众在强制与被强制、压抑与被压抑、束缚与解放之间的斗争，统治者试图通过强制、压抑、束缚的手段来奴役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努力通过种种方式来反抗强制、压抑和束缚，争取自己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曾针对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压制而主张回归“自由的人，真正的人”^③，确立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④的解放要求，真正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⑤，倡导在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彰显人的自由个性。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建基于人的本性，表现着人的本性。^⑥人的本性的展现，不仅包括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一个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全

① [法] 布罗代尔：《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承中译，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② 何兆武、陈啟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08—4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6页。

⑥ 高青海：《论人的“本性”——解脱“抽象人性论”走向“具体人性观”》，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

面发展的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同时应该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因为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并不矛盾，全面发展指人发展的完整性、统一性及和谐性，自由发展指人发展的自主性、独特性和个别性。自由发展的本质，就是个性发展。个性发展的核心就是人的素质构造的独特性，这主要体现在人的基本素质各要素在发展中体现出的独特性和人的各基本素质及其内部各要素在其组合上呈现出的个性化。具体表现在受教育者身上就是呈现各具特色的个性和特长。全面发展并非要扼杀自主性和独特性，因此，马克思提倡“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大力倡导人性自由、独立个性。因此，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品德素养和文化素质的全面发展以及各种素质之间的协调发展。人性自由和独立个性，即人的品格，往往体现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体质能力、精神状态、心理倾向及行为特征之中，反映的是人的个性差异。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追求人的自由、自主、独立、解放、和谐、完善的过程，也是人的自我价值和个人尊严的实现过程，就是将人从受强制、遭奴役、被凝固的人格与人性失衡、扭曲和畸形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

由上可知，追求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是整个中国教育活动史的一条主线，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人的自由成长而全面发展的历史。同时，我们也十分清楚，中国教育活动史毕竟是世界教育活动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活动，理应从总体史观的视角，将中国不同时期的教育活动放在世界教育大环境中去考察与定位。从中西文化教育交流视角，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发展史主要经过追求自由、张扬个性从而促进文教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先秦时期是中国人追求自由个性、教育原创的轴心时期；从魏晋到隋唐，进入文教繁荣与再创辉煌时期；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成为真正思想启蒙、人格解放的重要时期。

纵观世界历史，大致经历两个轴心时代，一是古代轴心时代，二是现代轴心时代。古代轴心时代主要以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四个文明古国以及后来崛起的古希腊、古罗马等几大文明为核心。这几大文明

均有文字记载的生动的教育活动，这些教育活动孕育了第一个轴心时代的文明、文化和教育。“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这几大文明发祥地，成为世界教育活动的“源头活水”。然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一直延续下来，其他均被历史所湮没。中国不仅创造了古代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构成第一个轴心时代的核心，而且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与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创建了新轴心时代，成为现代新轴心时代与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并存的核心成员，并且其地位仅次于美国，堪称现代新轴心时代核心成员。当然，中国在创造自身文明的同时，保持着开放的态势，不断地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中华文明在不断影响世界，世界各地文明也影响过中国，如“东汉魏晋以后的印度，战争以后的日本，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改革开放以后的韩国”^①以及美国、欧洲的文化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均对中国产生过一定影响。说明中国属于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

中国教育活动源远流长。“自有人生，便有教育”^②；自有人类活动，便有教育活动。教育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天然组成部分，并且与人类活动始终相伴随。人类早期教育活动往往融入生产劳动、日常生活与礼仪活动之中，这便铸就了原始社会教育活动的自然性、自在性和自发性。到父系社会时期，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引发了社会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生产活动、生活实践与教育活动也在悄然改变，即随着文字的出现，教育活动逐步从劳动与生活的场域中剥离出来，开始了学校雏形或早期学校教育活动。

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活动，与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一样，是世界文化教育原创的轴心时代，形成了以“六艺”教育为核心的自成体系、规范完善、风格独特的教育活动模式，与古希腊罗马时期形成的以军事体育教育活动为中心的西方教育活动模式，共同为世界教育实现人的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追寻与教育理想提供了历史范式。这两大教育活动系统，遥相呼应，各具特色，真可谓“横看成岭侧

^① 易中天：《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② 杨贤江：《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页。

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第一个多元化、大繁荣时期，是教育活动由官方垄断向民间扩展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教育初步探索以促进人的思想自由、个性发展、人格独立为指归的开端。先秦三代拉开了初创文教政策并为教育确立规约的序幕，也为后来历代开展文教政策制定活动奠定了基础。夏商周三代文教政策的缘起与原始宗教和祭祀仪式不无关系，因此，考察中国古代文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可以从宗教角度入手，并且呈现夏朝重武、商代重德、周代重人的文教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教育活动堪称先秦教育的一大亮点，尤其是孔子及其弟子以思想自由、精神自由、个性解放为特色的教育活动，成为古代私学活动的先声与样板。稷下学宫，开启了自由讲学、民主论辩、师生和谐的教育活动之风，并为后来的书院讲学之风的形成积累了经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直接称之为“稷下书院”^①，将其视为古代书院之源头。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活动明显呈现以追求个性、崇尚自由为主的特征。

秦汉时期，是将统治者意愿极力强加给文化教育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首个大一统王朝对受教育者人性压抑与束缚的时期，同时受教育者也在反压抑、求解放的抗争中力求实现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从文学史、哲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学术领域，也可观瞻这一时期追求自由民主和个性发展的教育活动特征。如果说秦汉时期教育显现出中央掌控过度、教育内容单一、官学教育活动主导等特点，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展现出政权更替频繁、文化环境宽松、思想文化多元、私学活动流行等特征。此时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教育活动，以其入世性与现实性在全世界独树一帜，异彩夺目，引领潮流；相反，西方教育活动则笼罩在了宗教活动的阴霾之中，教会垄断办学权，宗教经典充斥教材之中，一片沉寂，缺乏生机。秦统一全国之后，重用法家治国，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打压儒家私学，因此教育活动跌入低谷。西汉吸取秦亡的教训，确立了儒学在文教界的独尊地位，恢复私学教育活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

动，并启动了中央最高学府——太学的教学与管理活动，博士等教官的日常活动与太学生的学习与社会活动成为当时文教活动的主流。文翁兴学，又拉开了地方官学教育活动的序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争不断、时局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分散的政治统治，给文化教育留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我国第二个思想大解放时期，文化教育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努力实现再创辉煌的目标。一方面，儒、释、道三教并存，文化思想多元发展；另一方面，私学与族学蓬勃发展，民间办学活动频繁，促进了民间文化教育的发展与繁荣。社会教育活动以宗教教育为主，特别是道教与佛教教育活动成为当时社会教化的主流。

隋唐时期，是中央集权规约下文教日益繁荣的时期。尽管在科举制度导引下教育活动逐渐呈现出目的性、功利性、规制性、单调性等特点，但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亦可体现出士子对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再次进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时期，教育制度进一步完善，教育观念业已形成，官学教育进一步趋于成熟。隋唐学校教育活动的鲜明特点是受科举取士的直接影响，科举考试犹如指挥棒，将各类学校教育活动导向应试。如学习诗赋之所以成为唐朝学校教育活动的重点内容，就是因为诗赋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官学教育活动多样，除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教育活动外，还有中央各部门设立学校的教育活动，以及书学、律学、算学等专门学校的教育活动。各类官学日常教学活动，主要围绕科举考试科目，使得师生日常生活单调乏味，教育集中于智德两方面，缺乏体育活动，也没有丰富的课余活动，可以说是一种程式化的极富目的性的单调生活。书院教育活动初露端倪，私学与家学教育活动尽管没有魏晋南北朝发达，但仍然发挥着对官学教育有益补充的作用。唐朝的民间教育交流活动频繁，日本与新罗等国的留学生在华学习活动异常活跃，可谓史无前例。

宋辽金元时期，是一个科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先后兴起的书院自由讲学、民主论辩之风，展现了这一时期学院式教育活动崇尚自

由、追求民主、彰显个性的时代特点。宋朝由于长期受到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西夏和金的侵扰，内忧外患，无暇全力顾及文教事业，尽管朝廷掀起三次兴学运动，但总体来看，官学大不如前。因此，书院教育活动十分流行，形成了书院以自由讲学、交流研讨、自主学习、民主管理为特征的教育活动模式，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追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价值取向。宋代以后，科考活动进一步完善，并仍然对各类官学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宋代的社会教育活动包含民间风俗教育活动、民间传艺授徒活动、民间宗教教育活动等，其中道教教化活动和佛教教化活动成为社会教育活动的主流。另外，辽、西夏、金、元的教育活动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少数民族教育烙印，既保持着本民族的教育特色，又吸引了汉族儒学教育的精华，明显带有民族文化教育融合与兼容的教育个性。

明清时期，是一个受教育者人性受压抑向求取自由解放的转型时期。当专制统治走向极点，使人性受到压抑、自由受到亵渎时，西方传教士来华活动，为中国传统教育活动带来一股新风，从此逐步使古代的教育活动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多元。可以说，西学东渐，逐步使中国教育走向开放，迈入世界。同时，教育活动也呈现出由人性压抑、自由凝固、人性失衡、个性扭曲开始向追求人性自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转变，可以说，是一个由传统封闭向近代开放过渡的转型期。这是非官方教育活动所展现出的初露端倪式的新气象。在主流的官方教育活动中，仍然延续着愈演愈烈的专制集权压制下个性自由丧失的传统模式。因为明清时期的封建集权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高度的专制与集权政治严重影响到其文教政策的制定，使得这个过程充满政治干预色彩，其结果只能是良莠参半，积极与消极文教政策并存，高压与怀柔兼用。由于朝廷的强烈干预和八股取士的诱导，明清各级官学教育活动始终围绕以服务统治为目的、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以严格管束为手段开展活动。私塾教育活动是明清教育活动体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是对官学教育活动的有益补充，在传承文化和启蒙教育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明清私塾在中国教育史上达到了顶峰，塾师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活

动成为这一时期一种特色活动。

晚清时期是一个文化教育转型时期，新旧杂糅，中西交汇，使教育活动呈现出开放多元、异彩纷呈的时代特征。无情的历史并没有留给早熟的文化教育以永远世袭的第一把交椅。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从17世纪开始陆续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工业革命将不少国家带入了世界领跑者的行列，相应地，西方国家的教育与科技日新月异，呈现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西方先进的教育，中国教育进入一个在被动中借鉴与学习的开放时期。进入近代社会，教育活动呈现出中西融通、开放多元、活动丰富等特点，中国教育活动首次开始被动地走上近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随着西方军事步步进逼，中西文化教育开始交锋。在剧烈的碰撞与冲突中，清政府统治体系中开明的官员意识到两种教育的差距，在接纳西方教育的基础上创办了第一批新式学堂，再加上大批西方传教士也借助其军事优势来到中国办起了教会学校，这样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新式学堂、教会学校、传统官私学教育活动并存的局面。同时，在洋务运动时期首次开启了官派赴美欧留学活动和政府官员出国考察教育活动，中外教育交流活动更加频繁。

民国时期是现代教育的奠基期、发展期和过渡期，也是一个文化教育的建设时期，教育人士积极探索，奋发有为，开展了诸多有价值的教育活动。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带来了新气象，从此进入了摒弃传统、全面与国际教育接轨的新时代。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中国教育全面追求民主自由与个性发展的序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一批留美欧归国的教育家的推动下，我国掀起了新教育运动，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教育改革实践活动，全国上下出现了空前重视教育的大好局面。可以说，中国历史进入了第三次思想文化教育大解放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一个多种教育活动并存的时期，既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的教育活动，还有国统区教育、根据地教育、日伪奴化教育活动，呈现出多元化态势。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